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四九三期 ——  
(二〇〇六年四月五日报出)

本期目录 (zk0604c)

|        |                     |     |
|--------|---------------------|-----|
| 【本刊专稿】 | 《为丁盛辩》补遗            | 余汝信 |
| 【史海钩沉】 | 周恩来处理武汉“7·20”事件 (上) | 徐明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z@cnd.org](mailto:hwx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 【本刊专稿】

##### 《为丁盛辩》补遗

• 余汝信 •

拙文《为丁盛辩》发表大半年来，得到不少读者尤其是原 54 军老战友的关注和鼓励。近日，更有知情者将珍藏多时的丁盛申辩材料及生前谈话录音记录辗转交予笔者，并建议笔者适时将其公开，以为还丁盛将军一个清白，出一份绵薄之力。

今年是文革发动四十周年。笔者始终认为，文革造成的破坏力之广度和深度，无论怎么估量也不为过。它不仅是某一个别阶层、个别人士的灾难，更是上达国家主席、下至黎民百姓的全民族的深重灾难。既然是全民族的，那么，祸延所及，包括了如丁盛等不幸被卷进政治旋涡几近没顶的高级将领，也就毫不奇怪了。

笔者在写《为丁盛辩》时，主要依据的仅是朋友的一份采访笔记，丁盛本人的申辩材料及谈话录音记录，当时并未能见到。现遵嘱将这部分材料公开发表，权作拙文的补遗。为便于读者阅读，在公开这部分材料的同时，笔者另以校注形式，对申辩材料中涉及的历史事实作了补充辅证，对涉及的人名作了简要注释，另丁盛谈话中或因记忆关系个别无碍大局处有欠准确，也在校注中作了适当说明。

#### 一、没有证据的《免于起诉决定书》

（余注：1977年3月26日，丁盛被宣布停职审查。同年11月5日，未经任何法律手续，被关押并被抄家，家属随即被赶出军区大院，丁本人被拉著到处批斗，至1979年4月，方予以释放。未料自1980年10月6日至1981年5月9日两案审判期间，再次被关押，两次关押，共达两年多时间。

自被宣布停职审查之后，除专案组具体办事人员外，没有更高一级的干部找丁谈过话，更不用说找丁核对过情况了。1982年6月，解放军军事检察院等单位三名普通干部召见丁盛，奉命向其宣布：因触犯《刑法》第九十三条，密谋策动武装叛乱，将对其“免予起诉”。次月，军事检察院下达了《免予起诉决定书》。）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免予起诉决定书  
(82)军检免字第13号

被告人丁盛，男，现年六十九岁，江西省于都县人，汉族，初中文化程度，一九三〇年七月入伍，一九三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司令员。因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有牵连，于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六日停职审查至今。

被告人丁盛一案，经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保卫部审查，于一九八二年六月十九日移送本院，提请免予起诉。经本院审查，确认被告人丁盛犯有以下罪行：

被告人丁盛，在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积极投靠江青反革命集团。一九七六年毛主席病重期间，江青反革命集团加快了阴谋夺权的步伐。八月八日晚，江青反革命集团重要成员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到上海延安饭店看丁盛时，进行了密谈。他们谈了在毛主席逝世后可能“打内战”，分析了上海附近驻军领导的政治态度和兵力部署。丁盛对马、徐、王说：“我最不放心的是六十军”，“这个军我指挥不动”，“这个军的几个师，就摆在无锡、苏州到上海这一线，我很担心”，“有什么事件，对上海是个大威胁”，并提醒马、徐、王说：“你们要有所准备”。丁盛还表示：“我是准备杀头的”。随后马天水即给上海民兵突击发了各种枪支七万余件，炮三百门，子弹、炮弹一千多万发。九月二十一日，张春桥在北京听取了徐景贤关于丁盛与马、徐、王密谈和给上海民兵发武器情况的汇报后，对徐说：“要谨慎小心，要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十月八日，徐景贤、王秀珍等人获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被拘禁，即决定发动武装叛乱。由于党中央采取果断措施，他们的武装叛乱没有得逞。

上述罪行，经审查核实，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被告人丁盛，参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密谋武装叛乱的活动，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的规定，已构成策动武装叛乱罪。鉴于被告人丁盛是从犯，根据《刑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决定免予起诉。如不服本决定，可以在七日内向本院申诉。

检察长 于克法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印）  
一九八二年七月六日

（余注：所谓“免予起诉”，就是你本来是有罪的，罪足可判刑。只不过本官考虑到你是从犯，慈悲为怀，格外开恩，不判你就是。

问题在于《免予起诉决定书》认为丁有罪的依据，仅仅是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的口头供述。这些供述中指控丁盛说的话，丁盛本人从来没有承认过。除了马、徐、王的口供之外，《免予起诉决定书》没有提供任何其他证据，可以证明丁盛有“策动武装叛乱”的具体部署和

行动。而仅凭马、徐、王的口供即认定丁有罪，这样的认定是合情合理合法的吗？

1996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明确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第四十七条明确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两相对照，上述《免于起诉决定书》所列罪名，还能站得住脚吗？）

## 二、丁盛：与马、徐、王谈话的真情及自白

（余注：自停职审查之日起，丁盛就一直不停地为自己的罪名申辩、抗争，但可想而知的是，没有任何成效。1982年7月军事检察院发出《免于起诉决定书》后，当月31日，南京军区政治部一位副主任给丁念了总政的电话通知：“退出现役，每月生活费150元，享受一般干部待遇。”11月，由专案组一名干事口头通知：“开除党籍”，丁盛几十年的党籍、军龄一朝完结。1984年6月，南京军区勒令丁月底前离开南京到江西居住。翌年，丁盛再度请求重新审理他的问题以弄清真相。以下为丁盛这一年中所写的申辩材料，原题为《与马、徐、王谈话的真情及我的自白》。）

### （一）去上海的目的以及76年8月8日与马、徐、王怎么见面的。

七五年我心脏病复发，尊叶帅的指示，从九月至七六年二月，一直在南京中山陵养病。讹传我不听叶帅招呼，去了上海治病，这不是事实。

七六年八月，军区八、九月份要在上海，杭州湾搞陆、海、空演习——这是由总部批准，有各大军区及总部的人参加，军区领导也全部参加的活动。这样，我因工作去了上海。

（余注：根据《南京军区大事记（1949—1985）》：1976年8月25日至26日，军区在浙江乍浦、岱山地区组织了师团机关带一个加强步兵营的登陆作战演习（“东海一号”）。参加演习的有陆军第1师和第3团机关和一个步兵营，海军东海舰队和军区空军部分兵力，共四千五百余人，各种舰艇六十三艘，各型飞机八十五架（南京军区《当代中国》军事国防卷编辑室编，1986，页166）。丁盛所言，确有其事。）

七月三十日，我离宁经上海视察演习部队及附近海岛部队。八月八日坐了一天海船到长江口大小洋山，李宝奇（上海警备区政委）到那儿接我。抵达上海，李宝奇问我：“你来了上海，要不要告诉上海市委？”我说：“不要”，九点多，我在延安饭店准备休息，秘书陈长顺告我：廖汉生政委的张秘书来说：“廖政委明天请上海市的医生会诊，要我给上海市委打个电话，以引起他们的重视”。陈秘书因我劳累要休息，想请党办李主任打这个电话，张秘书说还请司令打好，我就按这一要求给上海市委办公室打了电话。不久，陈秘书告我：“市委来电话说马、徐、王要来看你”，十点左右，他们来了，闲谈了一个小时，我们一起去看了廖政委。

就这样，客观因素促成我意外地见到马、徐、王，决非我有意安排要见他们，而达到所谓密谋的目的。

### （二）八月八日晚与马、徐、王谈话的内容。

一见面，彼此寒暄：“你们这么晚了，还来看我，”“应当”。“从哪儿来？”“从海岛来”。

我说了视察海岛的感受：“从长江口以东以南的地形看来，屏障多，兵力密度大，敌人（指

外来侵略者）若想走日本鬼子侵略中国的老路，肯定要失败的。而长江口以北，以东的地形我从没去过，但听说水网地区，没山作屏障，兵力密度小，这个地方我不太放心，以后要去看。”

我说：“这次我们部队要搞演习，要来很多干部，在车辆、交通秩序、副食品供应上都希望市委协助解决，要麻烦你们了。”

马说：“应当，不成问题。”

我说：“进长江口，水浅，大货船进不来，李先念同志讲过：每年罚款多少亿，你们挖个深水港多好呀！”

我问：“你们很忙吧？”

马说：“很忙，搞生产，忙给唐山运物资，这次唐山地震很厉害”。

马、徐、王主动提起：“军区七月份党委扩大会议开得好，抓住了问题的要害（这是检查部队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工作的会议，是错误的）。你们军区领导人的意见都是一致的吧？”

我说：“是一致的”。

马问：“魏金山（六十军政委）怎么没参加这次会议？”

我说：“他有病，住院了。”

马说：“上警的一个副司令董常云思想不通，他现在出差了，等他回来后，我们要批评他的”。

马又问：“李宝奇同志是怎么来上海警备区当政委的？”

我说：“是军委派来的，也是我们军区党委提议来上警当政委的”。

马问：“李宝奇这个人怎么样？”

我说：“过去不认识，不了解，你看怎么样？”

马说：“李说话圆滑些，他在军委办事组工作过，他和刘耀宗不一样（上警另一政委），刘是直筒子，有什么说什么，对就对，错就错”。

马又问：“刘耀宗哪儿去了？”

我说：“他有病，在黄山休养。”

马说：“欢迎刘耀宗回上海工作。”我没答话。

我说：“我身体不好，有心脏病，经常发作。”

马天水指著徐景贤说：“可以安排他去华东医院检查一下。”

“好，谢谢”。

坐了近一个小时，我们一块去看了廖政委。

他们有意打听上警干部及军区会议的情况是别有用心。当时我只把他们当上海市委领导看待，没能识破他们反革命面目，失去警惕和防范，这是我的错误。

〔余注：这一段普通的对话，以后却赋予了强烈的“政治阴谋”色彩，即《免于起诉决定书》中的所谓“分析了上海附近驻军领导的政治态度”。其实，即便马天水等有意打听是别有用心，也是“问者有心”而丁盛“答者无意”。

魏金山，时任陆军第60军政委。1960年代中曾任许世友秘书，可能有这层关系缘故，文革后魏升迁甚速，1990年代初曾任海军政委。

董常云，时任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员。1981年在此位置上离休。

李宝奇，时任上海警备区政委。1960年代中李德生任陆军第12军军长时，李宝奇是该军政治部主任。李并未如马天水所说在军委办事组工作过，倒是1969年12月随李德生到总政，任总政组织部部长。1972年5月李德生在北京军区时，李宝奇曾调任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李德生调津阳军区后，李宝奇于1975年10月降任上海警备区政委，文革后再度升任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军区副政委。

刘耀宗，时任上海警备区第二政委。1961年晋少将。文革结束后，刘似乎未有因马天水的话而影响他的仕途，1978年后历任安徽省军区政委，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三）九月三日与马、徐、王谈话的内容：

九月三日，十点左右，马、徐、王没打招呼，突然来延安饭店我的住处，我问：“你们来干什么？”马说：“最近有两批较多的外宾要来，看延安饭店的宴会厅是否容纳得下。”我说：“可以去看看。”

他们坐下来，我说：感谢上海市委给予军区这次演习的支援和帮助，马天水说不用感谢这是应该的。

马说：“市委给你们转去一封信，是无锡部队的。信中说：在部队招待所查出了四个箱子，不知放了什么东西。你们收到这封信没有？”

我说：“收到了”。

这时我告诉他：“我们也收到了一封信，是许世友儿子许建军写给某医院护士的。”他在信上说：“毛主席百年后要打内战。”我说：“打内战可不得了，我们已将这封信送中央了——送给陈锡联同志。”

马天水说：“我们也收到了类似内容的一封信，也送中央了。”

这事就说了这么几句。

（四）军事检察院的免于起诉书（下简称“决定书”）说：“八月八日晚，江青反革命集团重要成员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到上海延安饭店看丁盛时，进行了密谈。他们说在毛主席逝世后可能打内战，分析了上海附近驻军领导的政治态度和兵力布置。丁盛对马、徐、王说：“我最不放心的是六十军。”“这个军我指挥不动，这个军的几个师，就摆在无锡、苏州到上海这一线，我很担心。”“有什么事，对上海是个大威胁。”丁盛还表示：“我是准备杀头的。”随后马天水即给上海民兵突发了各种枪支弹药。这就构成我参与密谋武装叛乱罪。

（五）下面请组织听取一个老战士对党的自白：

（1）关于六十军的问题：

“决定书”上说：“我最不放心六十军”“六十军对上海是个大威胁”……“你们要有所准备”。

事实上八月八日晚谈话，除问到魏金山（六十军政委）哪儿去了之外，根本就没有提到六十军。

至于我说的长江口以东以北的地形，完全是从上海的海外防御角度说的。与在上海以西京沪线上的六十军没有任何关系。马、徐、王的供词说我对六十军“很担心”，这完全是移花接木的栽赃，彻头彻尾的捏造。

我说：“这个军我指挥不动……在宁沪线上，对上海是个大威胁……你们要有所准备，”我身为大军区司令，对下属部队根本不存在调动调不动的问题，事实上，我刚顺利完成了对六十军的调动。

我感到六十军的一个师配置在交通条件较差的淮阴一带，便提出将该师调到无锡市，经军区党委讨论，总参批准，七六年上半年该师调防，六十军军部也从江浦调到镇江。若说：“对上海是个大威胁，”这个“威胁”不正是我自己造成的吗？真是无稽之谈。

〔余注：陆军第60军基本部署调整是丁盛任南京军区司令员时提议并经军委批准完成的，这是不争的事实。据《陆军第六十军军史资料汇集（1947—1985）》称：“1976年3月，根据南京军区调防命令，我军军部，180师师部及所属各团，179师535团，军直高炮团、炮团，先后于3月15日至5月15日进行了部队基本部署调整工作”，“180师从苏北调至无锡，军部从南京调至镇江”（陆军第六十军精简整编善后工作办公室，1985年9月，页559）。部署调整完成后，60军军部驻镇江，所辖第178师师部驻苏州，179师师部驻南京白水桥，180师师部驻无锡，73师师部驻安徽霍邱城西湖农场。说该军所属几个师“就摆在无锡、苏州到上海这一线”，也不尽言，起码73师就不在沪宁线上。〕

（2）“决定书”上说我表示：“准备杀头”，这更是荒谬绝伦。我作为一个高级干部，有职有权，工作顺心，上下团结，情绪很好，心情愉快，神志清醒，我怎会出此悲观的混帐话呢？八月八号的谈话，除相互吹捧，并没有议论中央领导，也没有谈论全国的形势，我想的是演习，谈的是演习。我没有，也不可能说：“准备杀头”之类的话。

我在谈到什么问题时说“准备杀头”？它的前言后语是什么？它总不会是孤零零的一句话吧？！

（3）“打内战”是许世友儿子许建军写信的内容，怎么成了我和马、徐、王谈了毛主席逝世后可能打内战；本是九月三日晚上的谈话，硬不顾客观事实，给安在八月八日晚上；是为了证实八月十一日马、徐、王的突击发枪，是谈及“打内战”而引起的，好加予我策动叛乱的罪名，这样又制成一个错案。

（4）我和马、徐、王的关系：

我和马、徐、王过去不认识，七四年调南京军区工作后，在上海接触过三次，第一次是七四年三月，从舟山视察部队回南京，路经上海，晚上我们初次见面；第二次是七五年一军和二十军调防路过上海，王秀珍请我吃过一顿饭；第三次就是七六年八月八号晚和九月三日晚的两次谈话。在这前后，我们既没有工作上的联系，也没有任何书信、电话及私人交往。九月六日接到毛主席病重的电报，要我返宁，我去市委告别，如有谋反之意，这是密谋的最好时机，可我只告别一声就走了。从那以后，没有和他们发生任何联系，请组织详细调查我这一个多月的活动情况（从九月三日到十月八日）。

粉碎“四人帮”，我才认清了马、徐、王的真面目：他们蓄谋叛乱，早就狠抓上海民兵多次发枪。马、徐、王是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武装叛乱，搞武装叛乱是他们反革命思想本质的大暴露，怎能无端归罪于我的一两次谈话受我的影响呢？反革命分子马、徐、王的口供决不可信，他们为减轻罪责，妄图嫁祸于我，这就是他们的目的。

总检察院、法院的三名干部在八二年六月审理我的问题时，不听我叙述的事实，而相信马、徐、王的口供，他们说：“毛主席说审查干部要重证据，不轻信口供，你的问题虽没别的证据，而马、徐、王的口供就是证据。”

请组织相信一个老红军战士的自白，绝不要轻信马、徐、王造反派的为减轻罪责，而嫁祸于我的假口供。

我今年已七十二岁，去年摔伤后三次住院近况不佳，身体很虚弱。承受“反革命分子”的精神枷锁，殃及家属孩子。更痛苦的是多次申诉，无人受理，给组织的信，都石沉大海，我越来越感到生命危在旦夕，渴望在瞑目以前能得到党组织的关怀与过问。让我去北京澄清自己的

问题，并盼望解决我目前生活上的困境，党虽在组织上处理了我，可我仍坚定不移地相信党，依靠党，相信党会实事求是地解决我的问题。

### 三、丁盛：我所看到的江青

〔余注：有读者问，难道丁盛就是因为这么一次谈话获罪？他与“四人帮”到底有没有其他政治上的牵连？笔者回答道：直到今天为止，官方从来未有提供丁“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有牵连”的证据。本来，举证的责任在原告而不在被告，丁盛亦无须自辩。惟为解开读者心中的疑惑，以下引自丁盛口述、金光整理的《丁盛回忆录》的一章“我所看到的江青”，就权当是丁盛在此问题上的自辩好了。回忆录原文部分标点符号使用欠妥，笔者未有改动。〕

好，讲另外一个人：江青。七二年的三月份，汪东兴交待我一个任务，当面给我讲的，说江青要来广州疗养。交待我们几条规定，第一，你必须保证她的安全；第二，要让江青吃好，玩好，休息好，身体好，高兴！这是我的任务；第三，江青要做什么事情你不要管。关于江青到广州来疗养的事情汪东兴就这样给我交待的！当时他为什么交待给我呢？七二年的三月份这个时候，军队，我是广州军队的负责人，刘兴元走了，调到四川成都去了，韦国清走了，到总政治部当主任了，原来韦国清是广州军区第一政委，他也走了；刘兴元原来是广州军区政委，广东省委书记，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走了，这个时候，周总理就把这副担子交给我了！说：“现在，广东省委的书记，你当！兼革命委员会主任”。我当时在广州的地位，就是党的权、政权、军权全都要我负这个责任，担子很重！

〔余注：丁盛此处记忆有小误。韦国清自1966年11月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他到总政任主任已是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9月（仍兼广州军区第一政委至1980年1月）。不过，他因是广西第一把手而常驻南宁不在广州倒是事实。〕

1972年3月23日，中央决定调刘兴元到四川，任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为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广州军区党委第一书记；韦国清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不变，孔石泉为第二政委；调赵紫阳为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见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2〕15号）。〕

所以，江青要到广州来疗养，他就要交给我，他不找我找谁？在这种情况下，我感觉到这个任务很重，担子很重，所以我就召开军区和省里面的会议，讨论这个问题，把汪东兴这个话给他们说了。说了之后，广州军区组织一个接待小组，由副司令员吴纯仁牵头，他负责任；安全，派广州军区政治部保卫部长石勇，“石勇，你负责江青的安全”。还带两个保卫干事。生活就交给广州军区司令部管理局局长、副局长他们两个人，保证把她的生活搞好，生活搞不好唯你是问，她的医疗，她自己有一套医生、护士，她自己带来了。

当时我们讨论，也是喜忧参半，也高兴，因为中央毛主席信任我们广州军区，当时我们把江青看得很重，是毛泽东的夫人，中央政治局的委员，现在把她疗养的任务交给我们，我们很高兴。但是，可又不能出问题，出了问题可不得了！七一年的九月十三号，到七二年的三月份就是半年时间，原来就怀疑我们广州军区有什么问题，如果江青这次来了，她出了什么事，那我们跳到黄河都洗不清！所以一方面我们很担心，必须要搞好。怎么办呢？我们省委，书记怎么办？决定她来之后，我们大家陪同她看电影，我们就这个态度，也没有讲什么欢迎啊，吃饭啊，都没有。就这么定了。

那天，江青就从北京坐飞机到广州的白云机场，下来之后，飞机没有滑行到候机室这个位置，没有滑行，停在那里，我们就迎上去接她了。当时军区就是我了，任思忠政委，就是赵紫阳、王首道、孔石泉、陈郁、林李明，省委几个人！接到之后，他们就回去了，我和汪东兴一

起陪她到南湖一号，路上，汪东兴不允许我靠近她，“你隔远一点，你不要跟那么紧”，这个时候，他对我是不信任的。

〔余注：时任思忠为广州军区政委；赵紫阳、孔石泉见上文注；王首道、陈郁为广东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林李明为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副主任。〕

到了之后，住地是他们指定的，原来一号房，也是给她修的嘛，他们指定住一号，安排好了之后我们就吃饭，我和汪东兴两个人吃饭，我就给汪东兴讲：“汪主任，江青同志来了，我应当回去告诉我们军区的领导同志啊”！他想想：“不行”！我说：“这样他们会对我有意见的呀，她来了，我接过来了，我不告诉他们，这样不好”。“不行，要保密”！我就叹了一口气。汪东兴就说：“你看你这个江西老表！”这是江西人的习惯，我叹了口气。这样就算了，吃了饭我就回去了。他们自己安置，因为江青当时生活的一套人马她都有，医生、护士，设施什么都是她自己带来的，这个我们插不上手，不让我们搞。

吃了晚饭，我、赵紫阳、王首道、陈郁、孔石泉、林李明、任思忠，当时广东省委书记处的书记，我们广州军区的政委，就到一号，陪她看电影。

〔余注：丁盛这里说的也有小误，文革中省委不设书记处，仅称省委书记。〕

我们离她房子比较远处就下车。那时候我们真是，怕车子开近了一号干扰她，打扰她，在那里等著。她是不出来的，不知道干什么，一直等到十二点，叫我们去了，江青出来了，在房子里边，这样我们就到放电影的厅里去，说了说，我们这么多人陪您看电影，没有什么事情，大家看看电影。这场电影一看，就到了二三点钟了，因为我这个人习惯，早睡早起的习惯，到了十二点后，再睡觉我就不行了，就睡不着了。后来第二天我说这样不行，我吃不消，我们要上班，要办事情，晚上我睡不着觉，那我吃得消啊，所以我说，不行，我不能这样做了！我说今后，每天晚上我们去一个人！我们七八个人嘛，一个人一个晚上就可以了嘛。

第二天以后，我就不准备去了，排了，今天你去，明天他去，但后来去没去我也不知道，我也没问！反正我这儿是不能去了！

江青在一号住的时候，我和她的接触有三次，刚才讲的这是一次，第二次是一部电影试片，《龙江颂》，广东电影制片厂放的。【余注：应为珠江电影制片厂。】叫我去陪，我去了，去看电影，没什么说的，那电影我过去没看过，我看了看，感觉技术很好，我说拍得很好看，因为没有什么说的。这一次她拿来《古诗源》的样书，从北京拿来的，通知我们到五号，就是周总理的那个房间里面，她拿出这本书，就叫我们大家都看一看。是我们全体去的，就是书记，我是书记，其他也都去了。这是第二次。

第三次，有一天，她要去佛山石湾的陶瓷厂，她要看陶瓷。头一天，赵紫阳也在，我答应了，我说我去。第二天起来，我不想去了，我说紫阳你去吧，我不想去了，你陪她去吧！

赵紫阳说：“唉，不好啊，你答应了去，你不去怎么好呢”？这样，我从家里直接坐车赶去了，他们怎么去的我不知道，赶到石湾，正好看陶瓷，没什么话说，我这个人也不大善于说这一类话。这是第三次。

有一次，她到七号，毛泽东那个房子，在外面看完花草，我去了，去看看她。那里有个服务员，叫刘金华，她说：“什么刘金华，叫刘华”。这么改的。



江青四月初来的，大概住了个把月，全部事情，工作就由吴纯仁负责。吴纯仁有一次给我讲，江青同志要骑马。我说：“不行，骑马摔下来怎么办？”没有答应。后来我给汪东兴讲了，说她要骑马。汪东兴说：“你找匹老马给她骑嘛”！

这样到五月初，突然之间，汪东兴，华国锋来了。干什么呢？“我们来接江青同志”，接就接呗。没说什么，接到哪里去了？不知是去北京是还到上海，就这样。这就是第一次，除此之外没有见她。

第二次，七月份了，杨德中来的，是中办副主任，他是代表总理来的！到了以后，也是我接待，杨德中说江青同志要到这里来疗养，我这里没有说的了，表示欢迎。

〔余注：杨德中时为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处（警卫局改称）副处长兼中央警卫团政委。杨任中办副主任是在文革后的1980年。〕

总理指定她要住小岛一号。就是广东省委招待所，过去是岛，现在就不是个岛了！都连成一片了。

小岛一号的房子，是毛泽东主席住的房子。除毛泽东以外，周恩来住过，别人没住过。

这次的接待，还是第一次接待的原班人马。还是按照第一次那样的规格，还是由吴纯仁牵头，还是保卫部的石勇部长，还是管理局的局长，副局长他们负责，还有保卫干事，其他的一些人，还是他们具体地管。

这一次是住在小岛，市中区了，和住在南湖就不一样了。次序我就不记得了，很多很多的事情，特别多。有一次，她要去三元里。三元里有一个温泉，露天游泳池，要去游泳。这个事就那么巧，她从小岛坐车出去，到东山那儿有个铁路，那个铁路就在东山口上，火车来了，当然她就不能走啊，她就在那儿等著，等火车过了之后，她们就到三元里游泳去了。回来就找我了。把我叫去：“你怎么搞的”？我莫名其妙。“有什么问题，怎么了”？

“你没安排好”！

我还搞不清楚，怎么回事啊？

“没安排好，我们过的时候，车站的火车过去”。

哎呀，那个火车我怎么能够安排啊！谁也不能安排，谁也不能限制，我怎么知道火车这个时候过？我也不知道她们什么时候出发，我都不知道啊。全盘都是由吴纯仁他们在那儿管著的。

所以我就在那儿听着，训我，“你在那儿修一个立交桥”！当时我还不不懂这个“立交桥”，听也没有听过。我也没吭气，你说什么就说吧，反正我就听著！训了我一顿！

东山修立交桥，可不是个小事，那可不容易的。你看深圳这些立交桥，好大的工程啊。我那时候才当省委书记几个月呀！我什么都不知道。这是一次。那地方现在也没修立交桥，那不可能修，那怎么修？那个地方，人口那么稠密，怎么修？

有一次，因为她去三元里游泳，走了很远的路，看见马路两边栽了很多马尾松。就是栽在海边上长得很好、不怕风吹，长得也快的那种马尾松，又把我叫去了。“马尾松是陶铸的德政”，陶铸啊，原广东省委书记，中南局的书记。“没有用，你把他砍掉换掉”。这些工程我办得到吗？多少马尾松啊？谁也办不到啊！怎么能砍啊，听着呗！不吭气，我也不说我马上办，也不说我

不办，我不说话，你坐在那儿说你说去吧。这是一次。

训哪，真是个巫婆啊，这个家伙。穷凶极恶，那个态度，阴阳怪气，这是一次。

还有一次，浩亮，那个唱戏的，于会泳，还有那个跳芭蕾舞的，叫什么名字？刘庆棠！他们从广西来，因为江青住在那儿嘛，他们也到那儿，住在小岛！搞了个房子给他们住下。

我们过去在广东很朴素的，一般的人来，不摆水果的，他们来了呢，没有摆水果。他们也在哪里，江青把我叫去了，她就指著他们几个说：“他们是代表文化部来的，你怎么没给他们摆水果啊”？

像这些家伙，下贱啊，住两天，要水果，你有钱不会买吗？还要人家给你摆！我没吭气，我也没说摆，也没说不摆！反正我不吭气，怎么说你说去呗！训一顿！

他们几个人不知道来干什么，我也搞不清楚。从南宁来的，以后他们到长沙。长沙打电话来，问我们怎么接待的！问邵云舟，邵云舟当时是省委办事组组长，就像现在的省委秘书长这么个职务，什么事都管！后来摆没有摆水果，我也不知道，我也没有问。

〔余注：应为邵云升，时任广东省革委会办事组组长〕

又一次，因为广州八月份很热，下雨，小岛的路边上种了很多茉莉花，茉莉花长茎，长长的，所长是好意，怕长在路上不好走，怕江青摔跤，所长就把它修剪了，修剪得干干净净。本来是个好事！她又看到了，生气了，把我叫去！“你这个所长是个坏人”，无头无脑，坏人！是陶铸留下来的，我还摸不著头脑，她是不说什么事的，去到那儿你才知道。把我叫去，怎么回事呀？“嗯，你搞破坏，路上的茉莉花，都被他剪了，破坏了！”这个人真是不识好歹，一点理也不讲！我们就没有吭声。“要他作检讨，要处理，”作检讨，处理，怎么处理啊，叫他写了个检讨！内容我也没看，检讨以后就送给她了，她看了以后，不满意，又把我叫去了。“哎，所长的检讨你为什么还不签字啊！”问我为什么不签字？行啊，签字就签字吧。在所长的检讨上面又签了我的名字！这就说明我也作了检讨了嘛，不就这么个问题吗！

一点茉莉花有什么事？就是不合理，又值得这样子作法吗？

有一次，她想起来，“我要开会，讲话，你通知广州军政机关师、局级以上的干部，有几百人这么个会”。开什么会我也没有问。会是八月二十三日在友谊剧院召开的！“我要讲主席给我的那一封信”。毛泽东主席在滴水洞写给江青的一封信，信的内容，就是讲林彪在六六年开会的时候讲什么政变了，一大堆的东西。反正汪东兴交待我了，她要干什么我不要管，就是不交待我，我也不能管！管她呀，她把我们训得一楞一楞的，我能管她呀？你开就开吧！

她就讲，什么意思，怎么解释，怎么样的，讲滴水洞那封信！“你们知道不知道那封信”？讲的过程里，讲了两个事，一个是“七二〇”，武汉，陈再道，钟汉华，当时钟汉华正好到了广州军区当副政委，“我们怎么搞的，错了”，钟汉华当时很感动，很激动！怎么搞错了！这是一件事。讲七二〇，武汉的“百万雄师”。

〔余注：钟汉华1972年5月恢复工作，任广州军区副政委。〕

她讲王关戚，王关戚早就关起来了，她都推给大家，又讲到我，“丁盛，有山头主义”，讲我有山头主义，“但是，你没有搞阴谋诡计”，但这句话后来在南京审查我的时候，又成了“江

青保你过关”！保我过什么关，我是省委书记，七一年“九一三”到了七二年，我有什么关要她保，她能保我吗？她讲完了话，叫大家唱《国际歌》，准备散会了，她忽然又讲起了“九一三”事件，说那天清晨周总理给各地打电话，她就在总理旁边。周总理听了广州的表态之后，放下电话说了一句：“哎，丁盛好！”这时全场热烈鼓掌，她又补充了一句：“真的，这不是我恭维丁盛同志。”

再一件事情就是维特克，写江青的《红都女皇》，到了广州。一开始我不知道，后来我才知道的，她是把总参测绘局的张清华调来，要画图，要画个什么图。他们先到，后来把我叫去了，我也不知道干什么。她给张清华讲：现在美国的一个记者来了，她要写东西，她要一个图，要画个什么图。这个张清华，他也没有准备，他也不知道到广州来干什么。他说：“画图，我都不知道，我也没有带人呀”。

〔余注：《红都女皇》是讹传，维特克写的《江青同志》出版于文革后的1977年。张清华，应为张清化（1915～2002），时任总参测绘局局长。粉碎“四人帮”后因为江青提供地图一事受审查，后解脱，1988年获独立功勋荣誉章。〕

江青就指著我给张清华讲：“你找他，你跟他要人”，我也没有吭声。我跟张清华眼对眼地会意，点了点头！

后来在南京搞我的时候说：“你给了美国特务的地图，是毛主席从延安出发，到晋察冀，西柏坡的路线图”。毛主席从延安出发到西柏坡有什么路线图？我在广州从来没有听说过！毛主席经过的路线，画的什么图，我不知道，江青确实给维特克画了毛的行军路线图，问题不在于画没画，而在于这根本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即使有问题，责任全在江青，与他人无干。

维特克要一部历史书，《廿四史》，我也不懂，我也没有看过，不知道陈宏康怎么搞来的，给了她一部历史书！

〔余注：陈宏康，丁盛在广州时的秘书。〕

再一次，看电影，去了很多很多的人，我们的老婆，孩子，会议室里差不多坐满的人，那天张清华也去了，维特克也去了，这个时候，我见了，江青还介绍，这是维特克，这是我们什么人，我也没跟她搭话，我又不会说外国话。

又一次，我们省委，在那个小岛上开会。开会的过程中休息，我们在院子里散散步走一走，这个时候碰到江青，我们大家就走近去和她说话。

这个时候，记不起是谁了，我不是推卸责任，说：“江青同志，来了这么久，我们从来也没有请您吃过饭，我们想请您吃顿饭”。她想了想说：“可以”。并说这叫“团结饭”，由大家凑钱，每人还要交几两粮票。当时，每个人要出一块钱，拿小米呀，青岛出的酒，我们省委班子和她吃了一顿饭，这个事，后来在南京成了“江青专门请吃饭”。我说：“没有，我没有单独一起她吃过饭，我们大家吃了一顿饭，而且我在南京给你们讲过”，吃了这顿饭，我还说过她的好话，我说：“不错，我们吃饭，她还拿酒，拿东西，我们大家出钱”。这是一次。

再一次是“八运会”。“八运会”瑞典打兵兵球的那个本格森，到广州来比赛打球。原来江青没有说看，后来她要去看，她说：“我要去看，本格森打兵兵球，我要去看”。我们那个保卫部长说：“不行，不能去，早一点您没讲，我们没有布置，出了事情怎么办？”“不行，我要去”。她跟他缠。

〔余注：“八运会”误。1972年8月底，瑞典国家乒乓球队与中国国家乒乓球队在广州进行了友谊赛。本格森，1971年名古屋第31届世乒赛男单冠军。〕

保卫部长没有办法就打电话叫我，说江青同志要去体育馆去看打乒乓球，让我赶快去，怎么办？他劝，劝不住！我去了！去了之后，她就训我：“我怎么不能去？”我开始不吭声，不能吭声的。说了半天，你为什么不能去？你原来没有给我讲啊，您要说的话，我们要布置警戒，负责您的安全。您出了事怎么办？我承担不起啊！这一点您要体谅我。再有呢？现在太热，体育馆。热得不得了。

“嗯！你们为什么不装空调！装上空调，冷气！”

我去还没有去过几次体育馆了，我省委书记才上任几个月呀？我有这个本事修体育馆吗？当时也没有钱！反正我说不能去。

我说：“您一定要看也可以，我家里有个彩电，因为我身体不大好，是省委给我看的，我说你到我家里去”！

这样就算平息了。

我们那个接待组的全去了。她呢，她的那个保卫干事啦，还有护士什么人，到我家里去了，坐到二楼上看了一下！

她尽跟你捣乱，她看什么。看了一会，说：“我不看了！下楼去。”我那么楼下有个乒乓球的台子，“打乒乓球”！我们又不会打，我就叫我的小儿儿子小江，因为小江小嘛，他会打！就打了几下乒乓球！就这样，走了！

还有一次，我们当时在留园开会，保卫干事跑过来告诉我说：“江青同志来了！”她没有给我们打招呼！来干什么？说来看一看，到你们各个家都看一看！那时孟文虹她们都住院，都没有在！她来了怎么办？统统赶紧回来，走呗！

从留园到孔石泉那个门口，也不算很远，一百多公尺两百公尺！她也到那个地方！

“您来了”！

“我来看看你们大家，各家看看”！

后来我给她讲：我们都在这里了，你不必要再到各家去了，都是这个样，都差不多，要么就到孔政委家里看看就行了，坐一坐！

就这样看看大家。

是不是还有遗漏的？也可能有。我记得总共就这么多次数！因为我也不敢去找接待组的人问他们，一问，将来一查，“啊！你们对口供啊”！搞什么攻守同盟啊！所以我就不问他们！我记得到多少我就说多少！

时间哪次先，哪次后，这个我就不记得，有这么多次数！也可能还有一次、二次，大体上不会了！

在小岛住这次，接触最多了。后来就接走了，我也不知道是到哪里去了，是北京去，还是到哪里去，不知道。因为她走，我们不问他们的！

这是七二年的七八月份，最热的时候，那时候开会，她讲滴水洞那封信，广西的韦国清也来了，湖南的卜占亚也来了，参加了这个会。这是第二次。

〔余注：卜占亚，时任广州军区副政委兼湖南省军区第一政委，湖南省委书记，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1972年10月因有人揭发其“上了林彪贼船”而受审查，是年7月因“认罪态度好”解脱，被任命为兰州军区副政委。〕

七三年也是三月底四月初，她又来了，这次汪东兴他们没有打招呼，杨德中也没有打招呼，是“中办”来了电话。

七三年来，也是我去接的，没有住小岛，也没有住南湖，中办指定的住在松园，她第一次来在南湖。住的时候，也知道这个位置。

我把她接到松园，那个房子什么都是现成的，什么用具都是现成的，不必要布置，少什么，缺什么的现象是没有的！那儿位置很好！她住下来，我就走了。

住了几天，她不知发了什么“羊癫疯”，她去拣玉兰花。广东的玉兰花，你用扫帚去扫，到处都是。拣了这个玉兰花，要拿去卖。“江青同志拣了玉兰花要拿去卖”。卖两毛钱？她问我：“这个花你们怎么不拣起来，扫起来去卖啊”，“你们在珠江边上多种些茉莉花什么的”！我去看了一次。

她说：“我叫吴德拿点搞生产的什么草，种在田里面很肥那个草”。后来没有搞了。她要卖什么玉兰花，我们也没管了。

四月中旬，我们省委在从化办了一个读书班，我从广州到从化去了。到从化之后，呆了九天，读书班，看看大家，读书，这个时候我的心脏病复发，这样我就不能回广州，就在从化休息，广东五月份雨季，下大雨！我就没有回去！

从此，我没有和她联系，也没有见她，她什么时候走的，怎样走的，我都不知道。她第三次来，我就接触了两次，一次是接她，再就是玉兰花，让吴德给她办什么肥田的草！去看了一次。

从七三年的四月份，她离开了广州，我们是七三年的十二月份到了南京。从七三年的四月我见过江青以后，到七四年“批林批孔”，我在南京，七五年正常地工作，从来没有和江青见过面，没有来往，没有电话也没有书信。整整将近三年的时间。七三年的四月她到松园住下，我接她一次，看她一次，七四年我在南京，七五年我也在南京，工作嘛，将近三年的时间，我们没有见过面，也没说过话，也没有任何来往！

到了七六年二月份，反击右倾翻案风，到中央开会，中央的打招呼会议，转弯子，我们南京军区当时有我，有廖汉生，彭冲，我们三个人。彭冲是江苏省委书记，廖汉生是南京军区政委，我是南京军区司令，南京地区去我们三个人。在京西宾馆，我们住的那层楼是华东地区的，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他们住的大套，住在边上那一套。我们都是一人一间。我一间，廖汉生一间，彭冲也是一间。

二十一号的晚上，我睡觉了，我这个人睡觉早，晚上十二点过了，差不多、我迷迷糊糊睡觉了，我的秘书陈长顺叫醒我，“江青同志派人叫你去”！我也不知道干什么？我说：“做什么”？

“我也不知道”！

好吧，我就起来，起来后就去了。一进马天水他们那个房间，是大套，江青、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还有曾绍山，进去我也没吭声，她在那里骂邓小平！我什么都不知道，迷迷糊糊，坐下，她在那里骂邓小平，乱骂，什么都骂，“不让我讲话”，“我身体不好，我现在要讲话了”，“大寨，不让我说话”。

〔余注：曾绍山，时任沈阳军区政委，中共辽宁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文革后于1980年至1983年任济南军区顾问。〕

她在广州就骂林彪。江青这个家伙，谁倒了，她就和她的身体不好扣给人家。其实她和林彪关系并不坏。“九一三”之前她给林彪照了像的，那时候江青不是当了总政治部的什么顾问嘛！

〔余注：丁盛此处说法不准确。江青曾于1966年11月被宣布为解放军文化工作顾问，1967年1月又任全军文革小组顾问。〕

她在广州就骂林彪，在北京就骂邓小平！骂完了说，“有人要反对毛主席，你们老同志要保卫毛主席”！我们当然要保卫毛主席，毛主席不保卫还行呀？

骂完了，给了我们一本书，什么书呢？邓小平的讲话摘录，一本书。我就回去睡觉。

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我就给廖汉生彭冲两个人讲：头天晚上江青叫我去，她在那儿骂邓小平，右倾翻案风的风源，怎么怎么的。我把这个话原封原样地给廖汉生、彭冲两个人讲了！他们两个都在，因为我们住在一块，三个房子挨在一起的嘛！

后来廖汉生给中央写信，说：“丁盛那天晚上到江青那儿去讲了什么，我不知道”！你廖汉生怎么能这样子呢？我明明都给你讲了嘛，彭冲也在那里的嘛，问问看，讲过没讲过嘛！

所以这个人呀，做出这些事来，他给中央检举，有这么个条子：江青那晚叫去，我不知道，什么内容我不知道！

二十二号早晨吃了早饭，江青召集好多人开大会，在京西宾馆后面一个大的会场，开大会，她一个人在台上讲，就是这些内容，骂邓小平，骂呀，她声嘶力竭，疯子一样的！讲话阴阳怪气的，在骂！底下人也搞不清楚呀，那时候转弯子，怎么回事啊，后来华国锋他们才开会的，原来都不知道，她先在那里乱骂一顿，胡骂一顿。

骂完了之后，她就走下台去握手，每个人握手，廖汉生在我眼前，她先跟廖汉生握手，她指著廖汉生：“你呀，不能欺侮丁盛哪”！你看，突然说这么一句话！当时我一楞：没有欺侮我呀，我们关系还挺好呀！就是这个反应！

当然，廖汉生不可能说我和江青通什么气，因为我跟他讲了，从七三年到七六年二月这个时候才见面，什么都没有，但廖汉生当时也没有怀疑这个事情。江青她突然莫名其妙这么一句话出来！

后来在人民大会堂楼上一个会议室开大会，华国锋讲话，还有什么人我都不大记得，反正华国锋讲了话，就讲：“批邓，反击左倾翻案风”！“批邓小平”！右倾翻案风就是邓小平，他们这样讲的！这个参加会议的人都听见的！我们也不知道啊，搞不清楚啊！

开完会议，回去了。传达会议，把北京会议传达，邓小平怎么样的，右倾翻案风，我也讲了话。

这是对江青，别的没有什么事情了，就是这么两次以后，再没有见了！

（2006年3月）

~~~~~

## 【史海钩沉】

### 周恩来处理武汉“7·20”事件（上）

· 徐 明 ·

长期以来，人们议论、探讨1967年7月的“武汉事件”〔1〕，囿于一些场面性活动与事件的描述，缺乏对当年代表中共中央处理武汉问题的周恩来实际作用的了解。

好在，1980年代，当事人陈再道将军以回忆录形式披露了一些史实和个人遭遇、心理活动；1990年代，杨成武将军也以系列访谈形式，出版了对1967年的回忆。后来，《周恩来年谱》和一系列周恩来研究回忆问世，也提供了一些参考背景。2001、03年，海外更是出版了轰动一时的《王力反思录》和《晚年周恩来》。不过，许多专门澄清或涉及“武汉事件”的回忆、专著，谈到周恩来多是“犹抱琵琶”，特别对周恩来在1967年7月18日在武汉军区的重要讲话，又语焉不详乃至绝口不提。笔者收集现场实录性和口述史的文字《亲历者的口述——民众心里的武汉“7·20”事件》〔2〕（以下简称《口述“7·20”》），该资料从当事人群体性口述角度，首次披露了民众心中周恩来的一些活动、言论，引用了周恩来1967年7月18日在武汉军区师级与二级部长会议上的讲话。对照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出版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05），以及当事人王力后来的回忆〔3〕、给党中央的申述书，认真对比杨、陈将军的回忆，也对照了当时和后来流传出的传达、记录，认为现流传周氏“7·18”讲话内容精神，是比较真实可靠的。在王力给中纪委誊清的当时讲话记录公开给史学界前，我们运用这些材料来探讨有关历史。笔者就此具体问题，述说周恩来配合毛泽东处理武汉问题的史实，并认为，应回到历史环境理解当时中共中央和周的本意，这是弄清该事件历史的一个重要方面。

#### 一、代表中央到武汉

“武汉事件”的“英雄”与“罪魁”王力，在秦城受审和重获自由以后，一再说明周恩来的“7·18”讲话是代表中共中央代表毛泽东的，这一方面也许是想减少对他本人责任的追究，另方面客观上也是实话。因为周恩来的讲话稿在东湖拟就，此亲笔（毛笔）稿，据权延赤记录杨成武回忆的《微行——杨成武在1967》，是1967年7月17日深夜“（杨）刚从周恩来那边过来”，“将几页纸交毛泽东”，并说“……总理有个总结讲话，这是总理拟的讲话提纲，请主席审阅”。由于事关重大，时间也紧迫，“毛泽东破例地没有留下处理，当即看一遍，还给杨成武说：‘同意，他讲吧。史无前例么，没有经验，错了就检查，就改正，改了就好。’”〔4〕

王力《向党中央的正式申诉书》〔5〕在谈到“7·20”事件问题时是这样说的：“这里要说明的是：第一，1980年政法部门在预审中已宣布关于武汉事件不追究王力的责任了。那时中纪委要王力誊清两份笔记，一份是毛主席在1967年7月18日在武汉的谈话记录全文，另一份是周总理同一天在武汉军区高级干部座谈会上总结发言的要点。看了这两份记录之

后，就知道王力的讲话，正是毛主席、周总理讲的话。例如：确定‘钢派’等为‘无产阶级革命派’，要以他们为核心来团结其他群众组织，把‘百万雄师’当作‘团结对象’。周总理传达的中央方针更厉害，把‘百万雄师’定为‘保守组织’。这一点王力没有说。第二，至于要各派群众组织都‘撤除据点’，当时不但如此，还要各派都把武器交给军区保管，这是周总理为保卫毛主席安全而采取的措施，并不是专门针对‘百万雄师’一派的。这不能成为‘使矛盾激化’和爆发七二零事件的原因……”。

在公开出版物中，王力也申辩说〔6〕：“主席和总理关于武汉问题的讲话，我都有原始记录，后来中纪委要我誊清过，他们讲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总理的部署，是主席完全同意的。总理讲话中指出，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错误，要公开检讨；‘三钢三新’是革命群众组织，要以他们为核心来团结其它组织；‘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他们自己会起变化。中央的方针是说得明明白白的。……主席讲得就缓和一点了，说都是工人，我就不相信一派那么左，一派那么右，不能联合起来？工人阶级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等等。但是，总理讲的这三条，主席一条也未改变。这是主席18日晚召集总理、谢富治、王力、余立金、李作鹏、汪东兴、杨成武、陈再道、钟汉华开会时讲的”。

当时，中共中央指导湖北武汉文革运动的精神，与当年其他省市问题的处理原则无二，都是批评部队的支左工作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认为造反派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左派”，保守派是“团结对象”。大联合夺权的核心自然是革命造反派。在武汉“7·20”事件发生前夕，中央决策高层内部思考讨论的和公开的表态、宣传都是如此。

周恩来在7月10日前，并未下决心去武汉就地解决问题，但是7月6日以后他与毛频频接触：7日和毛泽东、林彪一起接见出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训练会议的代表（1967年文革三巨头一起接见军队代表机会并不是太多），在6、7日和9日，周恩来连续到毛泽东处开会；毛泽东提出要到南方走一走。（7）实际上他与毛泽东已经商议、统一了行止取向，甚至周在10日立即通知陈再道：可以不到北京汇报了，毛主席就要到武汉，在武汉解决问题。在13日会上，尽管他还和林彪、中央文革成员一起劝阻毛，以至劝说“我们已经商定请武汉军区和各派群众组织的代表来京汇报，解决问题，不一定非去不可”；但他很快就不再做无效的说劝，还果断地当场布置当夜就出发的一切要事。

即便如此，毛泽东并未明确解决武汉问题的具体办法，13日会议也仅仅是商议去不去，毛坚持要去，又就全国形势和军队讲了一些大道理，没有时间谈武汉具体事宜。所以，在6—9日前，周还持和中央文革商定的在京解决的意见（即与文革小组“6·26电话”精神完全一致），并未起草什么解决方案；在10—13日，也无具体要求和精力，起草处理武汉问题提纲。甚至，周离开北京前夕，还信告李富春、李先念、陈毅“我有任务离京两三日……”，并未准备久留武汉。看来，7月17日深夜杨成武拿给毛泽东的讲话稿，大致是16、17日周恩来思考、草拟的。其基本背景，来自于“毛泽东的战略部署”，数月来周对武汉情况的调查掌握，来自对其他省市问题解决的原则和经验，至于毛泽东的精神，具体来自6至9日他俩的议论（至今没有披露），也来自到东湖后大家讨论、毛泽东指示的（毛对武汉问题成熟的原则意见，王、杨回忆多有披露，本文暂不展开研究）。

在13日人民大会堂的高层会议上，宣布毛泽东一行南下武汉，三军领导人层面上的主要任务是保卫毛泽东的安全，周恩来打前站，当然并非单去武汉做前站、后勤，也不需要周事必躬亲地去安排毛泽东的安全保卫。1967年异乎寻常出现党政军高层大队伍随同毛泽东南下武汉（毛、周共赴东湖，这是空前绝后的一次；毛泽东“御驾亲征”解决一个地方的问题，在文革里也是唯一的一次）。周恩来的关键任务，就是配合毛泽东，出面解决武汉问题，而不仅仅保护毛泽东安全的层面上。在文革的1967年，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按《杨成武将军自



述》《杨成武将军访谈录》〔8〕所说，是日下午，毛泽东召集林彪、周恩来、萧华、杨成武和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开会，谈了“文化大革命”的总体设想，……然后提出要到湖南、长沙、武汉去看看，还说准备在武汉游泳。大多数与会者不赞成他去游泳。林彪说：“武汉的武斗严重，安全没有保障。”但毛执意要去。《微行》谈到周恩来不再劝阻，轻拍杨成武的手背，说：“成武同志，你的任务两个。一个任务，作为主席和我的联络员。传达主席的指示；凡是有我向主席的报告，由你转报主席。”他转向全体与会者，重新宣布一遍：“杨成武为毛泽东与周恩来的联络员。”他第二次轻拍杨成武的手背：“第二项任务，保证主席安全……要保证主席的绝对安全。”毛泽东的南下，带走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和军委工作的班子，留守北京的中央领导调整了任务，在13日下午的会议上，周恩来对于留守北京和武汉之行的人事分工，已有非常成熟和明确的要求，只是杨代总长的回忆没有一一述说。总的看来，当日大家并无时间讲武汉问题解决的具体事宜，周、杨的准备也十分紧迫。不到12个小时，人马均已上路。

王力回忆在7月15日那天〔9〕：“主席表示他要坐镇武汉，就地解决武汉问题。总理要十五日回北京，我很着急，向主席请示：总理不能走，中央讨论的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我们都不知道，帮助主席解决武汉问题没有把握。主席先问总理的意见，总理同意留下，主席说好。主席提出中央确定的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要先从部队解决”。可见，开初，周并未主动请缨，由自己在武汉主持解决问题，至少到7月15日，周才决定参加和主持解决武汉问题。写提纲则是之后的事。毛泽东关于武汉问题的原则认识和决策，要先从部队解决，《微行》和《王力反思录》都有大段披露，本文不再赘述，其他尚未解密。……

必须强调的是，毛、周空前绝后共赴一地处理问题，毛泽东亲自坐镇武汉，就地解决文革运动问题，可见武汉问题在毛心目中的非常位置。

7月10日周恩来对他的秘书们说：“主席对我讲，走，到武汉去，保陈再道去！”又（根据陈再道前些日对周的汇报）说：“近二十多天，武汉没有发生什么事，两派之间的武斗已经停止，武斗器械也陆续上交。这说明什么？说明陈再道和钟汉华可以控制武汉局势。解决武汉问题，依靠力量还是武汉军区……”（《微行》11页）笔者以为，这里没有披露周恩来秘书们讲述的全部情况，仅仅话音一转，似乎给人留下周似不同意毛去武汉、也不同意说军区无力控制局势的说法和印象。实际上，武汉的大规模武斗在6月27日以后基本停止（26日凌晨周还给造反派回电，制止动民兵武器），截至7月10日仅仅13天；小规模冲突延续到7月上旬始终不断，不过两派主要精力放在准备材料进京汇报上；即便如此，周、毛到达后，汉口与武昌还发生大型冲突，死了人。至于武器，造反派是在谢富治要求他们集中封存，周恩来起草讲话提纲时，才开始集中封存；“百万雄师”派的，完全没有上交，到20日的武装示威就公开出示了数万件。问题是陈司令报喜不报忧，要嘛是周恩来有意不讲武汉局势极不稳定，反流露出一点他对处理武汉办法有自己的保留。但是这些统统在真要去武汉前后发生了改变，否则他为什么把武斗、武器可能威胁毛的安全，始终放在至关重要的地位。这对于理解他在“7·20”后的认识与行为是有参考价值的。

另外，当时周恩来也并不反对就地解决地方问题的方式。据当时中央文革工作人员张根成回忆〔10〕：在1967年6月下旬准备去云南、四川就地解决问题时，周对王力说，毛主席的意思，解决地方问题，可以到北京来谈，也可以就地谈就地解决。并传达毛的建议，可以老、中、青三结合，带上红卫兵参加中央代表团的工作，也锻炼锻炼。周恩来才让从几个大学里挑红卫兵，提出了具体的标准和要求：政治上要绝对可靠，文革中表现好，有一定能力，身体要好，要严格保密。还明确指示：“那就从北航选，让韩爱晶派人吧”！选派的北航“红旗”的学生到了云南、川渝，后来参与处理武汉事宜，也恰恰是根据总理指示才确定的。（为弄清回忆的真实性，笔者专访“720”的见证者张根成取得证实，毛、周的这个意图，是张去具体落实的）平心而论，这些北京学生原来对武汉并不了解，谢、王、余也并未领受处理武汉问题的任

务。不过，周恩来不会不知——他从各个信息渠道——包括北航“红旗”，得到了一大批武汉社会实情的（诚然，也是有倾向的）汇报，而4月2日“人民日报”《正确地对待革命小将》社论，恰恰是在北航红旗驻汉联络站站长徐鹏飞提供的原稿基础上修改形成的，审批社论者，除总编唐平铸外，就是随谢、王到武汉的北航红旗的吴介之（研究生），周恩来不会不知他的家世出身。他清楚谢、王并没有携带与武汉问题有关的任何材料，中央也并无要谢、王主持处理武汉问题的精神。周恩来亲自拟定的讲话，只能是他数月——特别是7月里来准备的，代表了那时中央——特别是毛泽东的意图。

于是，周13日晚即飞武汉打前站，安排毛泽东住处。按高文谦的说法（11），“为了确保毛泽东此行的安全，周恩来决定派陆、海、空三军负责人随同前往，并由毛亲自点将的杨全权负责。……又打长途电话给谢，要他即刻赶赴武汉，接受紧急任务。……周恩来之所以对毛泽东武汉之行如此尽心竭力……还有两个不便为外人道的用心。其一，由于“伍豪启事”悬而未决，周氏当时在政治上还背有黑锅，精神负担很重，非常希望毛能够对他高抬贵手，因而有意以实际行动来处处表现自己对毛的尽忠尽职。其二，他当时已经看出武汉问题的背后是林彪、江青两大势力蓄意插手的结果，因而有意借重毛泽东的权威来遏阻林彪、江青联手整垮武汉军区、打倒陈再道的企图”。高文这里的“周恩来决定”的确说对了，林彪并不主张南下，也没有这个决定，似乎更没有说“派”三军负责人随同前往武汉。周在会上宣布杨的使命和身份，不论是事关重大也好，还是杨说的为了提醒文革小组也好，我们都不得不承认周恩来在这次武汉之行中，举足轻重的位置。至于高的“其一”，可惜是研究周恩来多年，居然终究脱不出俗套的书生之见；“其二”，或许是林彪、江青相继出问题以后的“事后孔明”，并附和政治斗争的非学术之言。从爆发武汉“7·20事件”前周恩来的所有言行举止看，我们似乎还看不到他已经觉察有林彪和江青两大异常势力，而且他们在“联手整垮武汉军区”（从现今党史的意义上看，所谓的林彪集团和“四人帮”，在当时还未形成，如果周与他们有分歧，还属于是党内思想和工作方法的正常分歧），否则他决不会轻易写出一个批评者称为“助毛、林、江为虐”的“7·18”讲话稿来。

如果说周真正反省和发现中央处理武汉问题的思想和方法可能有问题，可能是在独立师与“百万雄师”闹事之后。如果是抵制“左”的干扰，从4月到7月，他都在竭力去做，毕竟是他主持绝大多数的（外地问题）接见、谈话、决策、起草文件，并非林、江。他和毛泽东一样自信：到武汉是可以既排除来自右的、抵制文革的干扰，又能够排除来自“左”的、无政府主义的干扰的。对武汉问题，毛泽东与周恩来这对历史的搭档亲自商量、实地处理，从7月13日到20日，远在京城的林彪和江青实在是鞭长莫及的。

## 二、事件前的周恩来

7月14日凌晨2时半，周恩来、李作鹏离京，抵汉。周到汉后立即通过武汉空军副司令员刘丰，找来陈再道司令员，部署安全保卫工作。对于此，王力提供了关键的回忆（12）：“总理连夜打电话，并先赶到武汉布置，把宾馆的人都换了。原来宾馆的工作人员主要是“百万雄师”的，现在换成另一派。同时不是让大军区司令员陈再道负责主席安全，而是让武汉空军负责”。特别在18日晚，“临行前总理又强调布置让武汉空军绝对负责主席的安全。本来武汉空军司令员是傅传作，因为有人说他‘是贺龙的人’，过不了关，总理才决定由副司令刘丰和政委肖前负责的”（1007页）东湖宾馆工作人员当时分成两派，《微行》一书已经交代过，不过当时在宾馆内部并未武斗冲突，只是工作瘫痪了。从后来杨成武和张根成回忆，都谈到毛泽东与（造反派）工作人员有接见、谈话；据张根成说，谢富治在20日凌晨被叫起，先想到要稳定内部工作人员——造反派，说明的确“主要工作人员”已经换过了。可见，决定宾馆安全和日常服务工作，业已将武汉两派取向作为一个参考因素。后来悲剧性事实也说明，对此换班心怀不满的个别工作人员，就在20日凌晨带路（“百万雄师”）去冲击了百花二号——找谢富治

论理。更重要的问题是，将原来可以负责安全工作的陈再道——军区和独立师（8201），换成刘丰——空军负责，20日凌晨宾馆受到冲击时，军区值班领导则通知与空15军有历史渊源的29师（8199部队）来加强保卫，后来空15军介入控制武汉局势处理武汉问题；问题是从一开始由刘丰前往接总理就露出蛛丝马迹来。《微行》说陈再道听刘丰的电话就发火了，确是事实，而且是一个吴法宪玩不了小聪明，做不了小动作的组织原则问题。毕竟是迎接给毛泽东打前站的周总理，又是空军专机师的飞机，吴司令能够擅自决定一切吗？

从刘丰接机，到后来刘被明确负责毛的安全，再由与空15军有历史渊源的29师解救王力，空军掩护毛泽东离开被围困的宾馆到机场，空15军入城警戒、支左（又于8月组建武汉市警备区），刘丰在武汉事件里“勤王”立功，绝非偶然。可能毛、周在7月10日以前的会晤，中央在（北京）13、（武汉）14日会议，已经明确了毛泽东南巡武汉、解决部队问题要借重的军事力量——这就是武汉空军部队，以及曾属于15军建制的陆军29师。重大严肃的军队人事，决非林彪个人就可以倡议和私自决定、指挥的。

王力接着回忆表白：“我认为这样的作法很不妥当，但这些都是在北京中央定的方针。我过去没有研究过武汉问题，这次总理交给我的任务也是保卫毛主席，不是叫我去解决武汉问题”。（后谈到去街上看大字报，没有武汉军区的人作向导，更没有刘丰，“因为刘丰是总理指定的保卫毛主席的主要负责人，陪总理去接主席了”（1005页）；足以可见刘丰的位置一开始就与众不同）不论王力本人回忆和申述的心态与意图是什么，但这是一个重要的事实。张根成作为当事人提供了重要补证：“总理把8201的警卫换成中央警卫团的了；大家一开始就发现独立师（8201部队）蔡炳臣政委不满意，几天都在嘟嘟囔囔的，就是说把警卫换了，好像不相信他们”。（《口述“7·20”》，笔者已访张证实无误（13））并且在张的眼中，已经看到事件以前独立师政委公开表现出的不满。总理还未开始讲话，两位鄂豫皖的老军人（陈、蔡）已经为此对中央的安排深为不满。不过，直到20日事发，东湖宾馆仍是由独立师负责保卫，大门仍是8201看守，并没有调换全院警卫人员，中央警卫团也仅仅密切控制了梅岭1、2、3号一片建筑和树林、要道；在7月15日，武汉军区政委钟汉华也没有同意军区保卫科王科长和孔庆德副司令事前提出的用8199部队加强宾馆警卫的建议。20日凌晨，就出现了内外串通，冲击进入宾馆问题。尽管在场的独立师干部主观上要阻止来人冲击宾馆，并向师部和军区急报情况，也与8341卫队联系。

周恩来对宾馆一切安排停当，谢富治一行于14日中午到达；周同大家一一握手，并特别询问了北航“红旗”四个人的姓名、年龄、籍贯等，交代说：“主席今晚到武汉，他老人家一定要来游长江，叫你们来主要是协助保卫主席安全。武汉驻军过去是你谢富治的部队嘛！”谢富治反而迷迷糊糊：“我怎么不知道？”见状总理哈哈大笑（14）……原来，谢对中央要自己赶赴武汉理由还未曾认真动脑筋，不明总理意图。周恩来说：毛的记忆力真好，说武汉的部队是谢指挥过的，周要秘书一查，果然武汉驻军主要都是谢的部下。足以可见毛、周对此颇费了心思；此外，谢、王一行来汉首要目的也并非处理武汉问题。

如果说驻军曾是谢的部下，大概指1948年到建国前后的中野和二野一段历史（15）：中野的2纵是陈再道任司令，钟汉华任副政委，并列的陈（赓）、谢兵团，谢富治兼任4纵政委，秦基伟为9纵司令；1949年2月，中野正式改称二野，野司和陈、谢的部队有所调整；新陈谢兵团（第3兵团）司令员是陈锡联，政委谢富治，政治部副主任为钟汉华，下辖11军第31师师长赵兰田，1967年在空15军任军长，第14军（原4纵）第40师师长即1967年武汉空军的刘丰；原来老陈谢兵团的9纵，改编为第15军，也即1967年的空降兵第15军，下辖44、45师，是1967年“720”出事，赶调入城支左的部队；3兵团第10军的第29师，（也即1967年参加维持东湖宾馆和军区安全，奋力抢救王力的29师——8199部队）1950年12月划归第15军管辖，后赴朝作战，1961年才由武汉军

区直管。1961年6月，原隶属武汉军区的陆军第15军军部及所属第44、45师划归空军，与原空军伞兵师（后改称第43师）合并改建为空降兵第15军。所以周恩来讲武汉部队是谢的老部下，是意味深长的。周在14日一见到谢，就道出解放军序列历史渊源，谢反而未曾注意；毛、周均毕竟是率兵多年的最高军委领导，毛泽东认为解决问题，部队是关键，毋庸置疑，周在去武汉前，中央军委最高决策核心已经研究过武汉安全问题和部队问题，这大概也与确定倚重武空，由刘丰负责毛泽东安全有关。

晚上，毛泽东一行也就抵达了。按张根成回忆：“总理正与三军领导开会，汪东兴、郑维山走进东湖百花一号，一路走一路开玩笑说今天就只抓住一个扒车的是郑维山……大家一阵玩笑，气氛轻松”。或许这玩笑也说到毛泽东处，所以《微行》讲，17日总理叫参加听会，毛泽东还在埋怨大家劝阻他“一路都听你们说，连个鬼也没有扒车”！张根成见状，报告周总理汪主任到了，周出来，明白毛已安全到达，随即宣布散会，与谢、汪等就去毛主席驻地梅岭一号。

7月15至18日，杨、李、余、汪、郑和军区领导曾去江边踏勘，策划游泳事宜；周恩来和谢、王等都是上午在毛泽东处汇报，下午，与军区领导和师以上支左单位汇报，这些内容，在杨成武的有关系列回忆里已经十分详尽。17日会上，毛提出要周次日回京解决湖南问题。看来，毛与周，对武汉情况还是比较乐观的。王力回忆（16）则点出了周、毛意见的要点：“主席提出中央确定的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要先从部队解决。……总理主持军区党委扩大会，听取汇报，参加的不到30人。从15日一直开到18日。总理的总结不是个人的，而是传达中央的方针，以及根据在武汉了解的情况，提出了具体的指示。他的总结提纲是用毛笔手写的并经过了毛主席的审批。……总理的部署，是毛主席完全同意的。总理讲话中讲：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错误，要公开检讨；三钢三新是革命群众组织，要以他们为核心来团结其他组织；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他们自己会起变化。……主席就讲得缓和一点了。说都是工人，我就不相信一派那么左，一派那么右，不能联合起来。工人阶级没有根本利害冲突，等等。但是，总理讲的这三条方针，主席一条也没有改变”。

而且在17日的会上，毛泽东说：“（造反派群众）真正要打倒陈再道，怎么行呢？错误改正了，他们还要打倒，那就是他们的不对。陈再道就是不动脑子，少政治”。周恩来即插话说他主动促进陈毅与韩爱晶当面沟通之例，韩说“要把你打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周示意陈表示一下，但刚烈憨直的陈毅元帅却未吭气。

需要说的是，虽然周恩来在17日已建议毛泽东次日接见军区领导，当晚又与陈、钟二人单独谈话做工作；但陈再道直到17日下午，并不知周恩来的讲话原则正是毛泽东指示的精神，毛正在东湖亲自指导处理武汉问题，甚至认为是周恩来因循处理各省问题思路对湖北的个人认识。顿时陈十分抵触，不满周这一讲话，当场对要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表示不服气。周恩来又苦口婆心劝说陈：文化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没有经验犯了错误；错了改正就好；要你们承认错误，写检讨，是为了保护你们，不是要打倒你们。主席对此都已经表态了嘛！但陈再道依然不满，将支左办公室整理的工人总部的材料送给周，甚至扬言让总理去调查。说让他支持三钢三新三司革联，他是想不通的，“毛主席自己说要相信干部的大多数、军队战士的大多数、群众的大多数，这三个大多数都是支持“百万雄师”的，要给军队下面做工作你自己去做，我做不通”。其言语直接冲撞周。甚至“拍桌子说你有什么了不起，你……我还不知道”？以至指着周的讲稿扬言：“如果真是毛主席在你的讲稿上签字，我们就执行。周也（气的）拍桌子对陈说你不要以为我们拿你没有办法。”（17）

读到这段未曾披露的内幕，联想其他回忆和武汉事件后各个人的心态和态度，似乎感觉到，在文革运动的认识冲突背后，有一个深刻的未曾抚平的心理创伤：中央与四方面军的历史冲突。或许，陈再道与周恩来在四目对视之时，脑海里既难有“工人总部”也没有“百万雄师”，他们

同时回想起的是1936年底批判张国焘时，红军大学的许世友串联原四方面军30多高级将领试图拉回大巴山——被整的“反革命武装集团”错案，其中也有当时难以忍受过火批判的桀骜不驯的陈再道。诚然，周恩来想的是如何帮助陈认错过关，让群众认可谅解，同时不受心灵的伤害，而陈再道则想的是中央是否信任自己、有人要算计自己（过去军内一些工作问题的纷争，他总认为是“一方面军整四方面军的”）。武汉事件的一个悲剧性细节也许恰恰在这里，老一辈心理的历史创伤，可能还会暗渗血泪，影响着30年后的思维、情绪，乃至决策。卤莽少文的将军，完全知道军政元老在以往路线斗争里的角色和位置。另一方面，《微行》一再披露的恰有毛泽东和林彪在对待有关原四方面军高级将领事宜上，极其慎重和特别的需要，实非偶然心血来潮。文化革命中，中共中央一再保护备受冲击的韩先楚、许世友、陈再道，而且毛泽东在文革里特别倚重的军人就是四方面军的将军，恰是谢富治、陈锡联、许世友，还有郑维山、李德生、韩先楚，也非偶然。

深谙党、军历史和历史恩怨教训的周恩来（1936年批判张国焘和批判扩大化时，他恰好不在延安，从中央和中央红军而言，十分超脱），也特别明白必须保护一些心底有暗伤的刚烈老将（他多次苦口婆心劝戒红卫兵，要明白党内斗争历史中的教训，不要以为大方向对，就什么都对；政策方法不对，大方向就不能保证。而且说如果不把历史教训告诉青年人，就是对毛主席不忠。针对武汉红卫兵对待王任重的政策问题，他就苦心教诲：“现在你们重复（我们）四十多年前的错误，我心里很难过。你们只能比我们更好，如果你们比我们当初作得还差一点，那是我们犯罪”），但周恩来苦于一时难以说透，说服陈。王力没有将这段重要情况写进他的反思录，大概是为了当初要求的对“家丑”的“保密”，也为顾全总理和陈再道的面子。实际上，从15日到18日，周的讲话不能使陈接受，后者也当场表示了难以买账；陈在事后的检查，也坦白承认了这点。

陈与周恩来对抗，旁证是：“7.20”事件后，揭发批判陈再道，15军王新政委（后任河南省军区政委）揭发陈“煽动下面干部在会上给总理提意见，企图压中央改变态度”。军区副参谋长王步青（后任军区参谋长）揭发“钟汉华埋怨军区整理的材料没有及时送交总理和汇报”。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军区领导对周的善意苦心的始终不理解和极端抵触。这些抵触，确实是针对中央的。其二：独立师政委蔡炳臣，在18日回师部传达会议精神时，说：“中央首长来了四天，听了三天汇报，作了一天报告。我和师长本来是代表大家意见去向中央首长汇报的，但一看气氛不对，总理和王力根本不愿听取大家的汇报。钟政委在汇报时说一句，总理问一句，问得钟政委答不上来，只好把汇报提纲放在一边作检讨”，“总理和王力很注意我们两个（指师长和政委）”；在该师干部对此情极为不满时，还特别交代“不要提总理说的”，多少说明他们想留有余地，不想直接和公开对抗周恩来，而师领导和下面干部已经对周讲话非常不满。在7月20日下午，陈司令得知周将来汉，说“周总理来了又怎么样？还不是与王力一样”；同时，在独立师师部，有团级军官议论：“听说总理伯达要来”，“他妈的两个人还不是一个调”！（18）客观历史地说，在整个事件过程里，从陈再道到他的部下，已经对周恩来的观点和态度十分抵触。这种对抗情绪实际上比对王力来得更早更深层。这是没有被史家披露的，也是陈司令在毛、周离世以后，1978年中央又为“7.20”事件平反时，不再承认的一个重要细节。

会后，周恩来如前所决定，带陈、钟去受毛泽东接见（陈方知毛已在汉），毛亲自做工作，安抚了军区领导，重申了解决问题的原则，要帮陈再道下台阶。忠厚的陈表示接受主席指示，坚决照办。周也放心地回北京了，在当时，大家都相信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权威性，相信只要军区首长愿意按中央精神改正前期认识错误，对下面和“百万雄师”做工作，武汉问题可以在既定精神和正常秩序下，逐步解决。今天看来，大家都严重低估了文革激起党内和社会潜在的矛盾及其作用，高看了军队干部和战士、民众的心理承受能力，也严重低估了反对毛泽东文化革命做法的体制性力量和群众性力量的巨大能量。周恩来虽然多次说前面的省区有反复，在武汉军区也说湖北还会有反复，但他没有想到，仅仅在几个小时后，甚至还在毛泽东接见同时，反

弹已经在迅速、广泛地酝酿中。

这点，还是陈再道自己在口头检查承认的比较中肯：“七月十四号，总理一来，就说毛主席说，你们屁股不要坐在百万雄师一边。（我）不传达毛主席的指示，主席七月十八号的指示，要我们做好部队工作，做好‘百万雄师’的工作，也未传达，也未去做。为什么呢？就是自己这个反动的思想，就是不重视，就是抵抗毛主席。以为我开的几次会，都是搞的那。主席的这个指示总理说了，主席又说了，（如）传达下去，这个力量会多大！这个反动透顶了，连主席的东西都不传达。这不是反抗主席啊！还要怎么样反对主席啊！”“所以，开了几天会，周总理讲了，不是真通。……总是他（按，指总理）在讲，自己还在那里叫把过去整理造反派的假材料送上去看，为什么叫送上去呢？总是思想感到他们看到那方面，没有看到这方面，没有看到全面。我在那里表态，心里总还是抵触的，不愿意坚决贯彻。所以，总理、谢副总理开会讲了那么多，自己总是在那里阳奉阴违，不是真通，不是真想改，总认为还是要把情况讲一讲，材料还要他们（按指中央）看看。意思呢？是想不要恢复工总。工总…在我思想上……，我过去没有说心里话，（实际）认为生米已经做成熟饭，已经解散这么久了，现在工人到处参加了组织，有了这个谬论。继续对抗中央，对抗中央文革，对抗总理。就是不愿意贯彻。指示这么明确，这么英明、正确，就是抵触，不愿意办，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在继续顽抗，而且公开对抗中央，反对毛主席、周总理这些指示，拒不执行。所以，‘七·二零’事件不是偶然的”。（19）

陈在当时高压的批判下，自己上纲很高，戴了许多大帽子，不可作为凭证，但他也说了实话，就是对周传达的中央精神，以致对周本人，实际上是非常抵触的。这些事情，陈再道在毛、周在世之时，没想否认也不敢否认，所以在1972年他被解放出来，担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时，还专门写信给湖北省革命委员会，重申自己解放了，不意味着自己在“7.20”事件做对了，没有错误了；声明他不会翻这个毛主席和周总理定的案。

军区支左办公室在1967年7月底于军区内部的揭发批判会上，就谈到当时向总理汇报的实情：“向总理汇报以前，钟汉华就到陈再道那里问他，我们怎么汇报？谁讲？陈再道说：‘你去讲’。并且表示，还要坚决，不能动摇。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要继续坚持错误……可是当总理讲到工人总部的夺权和搞经济主义的时候，陈再道很嚣张的讲‘你们调查嘛’！原来我们有些同志不了解这些情况，说谢副总理、王力来了三天就决定武汉问题是不是太草率了。同志们，不是那样子……汇报什么问题人家拿出来，人家说的清清楚楚。我们有些首长说某某人被打了，怎么怎么样。总理问你到现场没有，叫什么名字，根本答不上来……比如‘百万雄师’调人（武斗），调人有个调令，这个中央全清楚，中央都有……以后总理拿出来了，总理说：‘是这个调令吧’。人家清楚的很”。（20）

钟汉华政委在当年11至12月于湖北学习班（按：指军区、独立师人员在北京的学习班）上的检查，也如实地回忆情况与披露自己心态：“14日总理向陈再道和我传达了主席的宽大关怀和又严肃的警告，要我们不要把屁股坐在‘百万雄师’一边。由于我们反动的立场，就听不进去，也不向常委传达。谢副总理和杨代总长都和我们打了招呼，说工总要翻案。我们的反革命决心不变，仍按原方案汇报。为了稳定决心，也不向常委打招呼。在15、16两日的汇报中，中央首长的插话又进一步明确了我们的大方向错了，工总要翻案，三新二司的大方向是对的。显然我们的攻击失败了，但心不死，又把后梯队（各大单位的领导）调上来攻击中央。要中央听听下面的意见，其实都是我们定的调子。下面对“百万雄师”、三新、二司是有不同观点和见解的。特别是“百万雄师”挑起大武斗以后，这是再次企图逼中央照我们的方案办。……

“18日下午，总理作了正式结论，表面上（我）也假意表态，承认方向、路线错了，但这时五心不定输个干净，内心不服。当晚主席对陈再道和我亲自教导，要我们好好向‘百万雄师’作工作，作好部队思想工作，步子稳妥。工作细致深入一些。由于我们顽固坚持反革命立

场，对主席没有感情，仍是拒不执行，也不传达。真是罪该万死，千刀万剐，也赎不了我的罪。周总理的指示，再三交待不要向下传达，我批准蔡炳臣传达了，这是‘7.20’反革命暴乱爆发我点的第一把火。19日夜谢副总理等同志指示后，我不按最高指示办，反而叫大家快传达，分秒必争。这是我点的第二把火。由于我们长期的毒化群众，当时已是处于干柴浇汽油的景况，见火就要爆发。我的罪过大啦。‘7.20’反革命暴乱的火，是我点起来的”。(21)

诚然，这里钟汉华在当时高压情势下，自己无限上纲，给自己戴了一些“反革命”大帽子，有失偏颇；不过可以从他们交代中看到周恩来那时候对军区领导真诚做工作，陈、钟二人甚不领情，步步退守的实际心态，也看到他们从抵触、被动，到组织失策、失误的心理和失控的过程。武汉军区领导一级自己的思想完全没有通（不可能通），又在极其艰难的思想工作未做时，将矛盾直接踢到下面，仓促布置传达周恩来讲话精神（19日夜已经传达到排级，并传至士兵）；军区秘书科后来在追查事件时揭发：19日下午独立师战士到值班室造反，反对四点指示，当时机关干部都不知道什么四点指示，“为何独立师知道那么早？又没有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结果造成部队思想大混乱，甚至发展到不可控制的地步”（22）。显然是让中央被动难看，帮了周恩来的倒忙。实际情况是：独立师蔡政委18日在钟汉华处获准传达总理指示后，当晚师党委常委会决定次日上午传达到各团团长、政委和司、政、后科长；午夜，独立师政治部副主任周忠又到蔡政委家商量，居然两人私下决定扩大传达范围。19日早晨，周忠令管理员阎保国通知机关排以上干部、直属分队连以上干部，以及部分支左人员参加听传达。所以在19日下午，8201全师干部战士都已经得知中央对武汉问题的四点基本指示精神。独立师并未参加“四大”，个别人这样做，显然违反了党纪军纪。于是在8201部队内有预谋、有组织的活动下，在没有任何思想转弯工作的前提下，中共中央的意图提前被泄露了。文革结束以来的流行说法是王力和造反派群众泄露了中央精神，激怒了不同观点的群众，与历史事实完全不符。王力在武汉的公开讲话，从未去传达与透露总理讲话的内容，造反派群众则是在8201部队和“百万雄师”群众将所谓的“四点指示”在街头公开，才听说的。

（未完待续）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丁凯文（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             |          |
| 投稿专用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             |          |
|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             |          |
|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             |          |
|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 <a href="http://www.cnd.org/">http://www.cnd.org/</a> |             |          |

---